

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

余敏玲

摘要

本文利用典藏在莫斯科的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的共產國際檔案，來探討蔣經國在蘇聯的求學生活。包括他的學習情形、感情生活、政治生活，特別是他父親清共之後，他在蘇聯如何自處的問題。同時也初次披露蔣經國與馮玉祥女兒馮弗能的戀情和他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候補黨員的會議討論。作者試圖用人的角度，而不是用完美無瑕的神聖領袖角度來看蔣經國留學時期，期能呈現出一個較真實的歷史面貌。

蔣經國在校認真求學，俄文學習或許不盡理想，思想上的進展則頗受其父肯定。此外，他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甚至一度成為托洛斯基派。他在父親清共之後譴責其父為革命「叛徒」，未必完全是迫於情勢而有的違心之論，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蔣介石勉勵他要致力於革命，加上蘇聯教育與交友的影響，使其日趨左傾而有的肺腑之言。由於蔣經國的留俄回憶錄與俄國檔案的記述出入之處甚多，本文進而討論他的留俄回憶錄為何出現不同版本的問題。

關鍵詞：蔣經國 蔣介石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 留學

Jiang Jingguo's Student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as Reflected in the Russian Archives

Yu Miin-l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intern archives in the Russian Center for Preservation and the Study of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RTsKhIDNI) in Moscow, this article explores Jiang Jingguo's student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by focusing on his intellectual, romantic and political life. It is also the first study to reveal his relationship with Feng Funeng (Feng Yuxiang's daughter) and the meeting minutes of his application for candidate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a word, this study tries to present Jiang Jingguo as a human being, rather than as a flawless leader or a saint.

Jiang Jingguo was a serious student. His progress in Russian might not have met his father's expectations, but his father was very happy with his intellectual progress. Also,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ven became a Trotskyist for a time. Considering his father's encouragement to devote himself to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his Soviet education and his communist friends, I argue that his denouncement of his father after the purge in April 1927 very likely reflected his sentiments.

Compared with Jiang Jingguo's memoirs written after his return to China, the archives cannot sustain many of Jiang's statements.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his memoirs 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Key words: Jiang Jingguo, Jiang Jieshi, Guominda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intern, Studying Abroad

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

余敏玲*

- 一、前 言
- 二、初入俄鄉的學習與感情生活
- 三、蘇聯求學時期的政治生活
- 四、結 論

一、前 言

坊間關於蔣經國的著作不少，這幾年大陸出版的更多，但其中稗官野史居多，提到蔣經國留蘇時期的部分，更是乏善可陳。試以最近十幾年來關於這主題的中文書籍為例。彭哲愚、嚴農訪問蔣經國在莫斯科的同學徐君虎等人寫成的《蔣經國在莫斯科》，¹ 書中有些蔣經國在蘇聯的小故事。不過，書名雖為《蔣經國在莫斯科》，篇幅卻只有五分之一談蔣在蘇聯，其餘均係蔣與徐的交往情形，而且有些小故事難辨真假。蔡省三的《蔣經國與蘇聯》，² 文多意氣之詞，能採信者有限。曾任蔣隨身秘書的漆高儒數年前所撰《蔣經國的一生》，雖然在〈編輯者言〉中聲稱該書蒐集了蘇聯等地的第一手資料，然而詳細對照內容，留蘇那一段，基本上還是取材於蔣經國本人所寫的〈我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本文修改期間，承蒙呂芳上、陳永發、翟志成、楊貞德諸位先生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文中所有錯誤均由作者負責。

¹ 彭哲愚、嚴農，《蔣經國在莫斯科》（香港：中原出版社，1986 初版，1987 二版）。

² 蔡省三，《蔣經國與蘇聯》（香港：草原出版社，1976）。

在蘇聯的日子)。他的新書中關於蔣經國留蘇那一段，仍不出前書窠臼。³ 李玉貞在北京出版⁴的《十二年春秋愛與恨——蔣經國旅蘇生活秘聞》，係利用關於蔣經國的著作與回憶錄等資料寫成，文字十分生動，但部分敘述欠缺嚴謹地史實考證，因而減低該書的可信度。⁵ 江南（劉宜良）所寫的《蔣經國傳》是目前唯一附有註解的關於蔣經國著作，然而受限於作者當時的政治環境，加上蘇聯檔案當時尚未開放，書中關於蔣在蘇聯那一段，基本上只是參考另外一位留蘇學生盛岳的回憶錄而來。⁶

相對於以上各書，本文之撰寫則參考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的共產國際檔資料，但不曾用到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局和蔣經國的私人檔案。國家安全局的檔案基本上目前對外開放者甚少，須有特殊關係才可能看到。而依照俄國檔案法的規定，個人檔案須待文件產生後七十五年才能解密；在解密之前，原則上只有其家人或持有其家人親筆同意書才能向檔案館申請閱覽。由於筆者沒有看到蔣經國在烏拉爾山工作與回國前的檔案，本文的重點是蔣經國的蘇聯求學時期，特別是在莫斯科求學期間。本文試圖探討下列問題：蔣經國在蘇聯的學習情形、感情生活如何？他參加了哪些政治活動？他的活動經驗與他的同學鄧小平比起來又如何？蔣介石清共之後，他在蘇聯如何自處？蔣經國的同學又如何看待他的表現？蔣經國回國後所撰寫的留俄回憶錄有兩種版本，原因何在？

³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從西伯利亞奴工到中華民國總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80），頁1；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台灣人》（台北：正中書局，民86）。

⁴ 據李玉貞言，在台北出版的《少年蔣經國傳：一段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異色歲月》（台北：日臻出版社，民84）係盜版，且未經作者同意，擅自刪減更動許多文字。

⁵ 茲舉一例，根據對徐君虎的訪問，李玉貞認為蔣經國是與邵力子一起到莫斯科，同行的還有馮玉祥的兒子等人。李玉貞，《十二年春秋愛與恨——蔣經國旅蘇生活秘聞》（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頁75；事實上，邵力子是1926年夏天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才到蘇聯；馮玉祥及其子女也是要到了1926年春末夏初才到蘇聯；而蔣經國於1925年11月已到莫斯科。見邵力子，〈出使蘇聯的回憶〉，《人物》，1983年，期1，頁167。

⁶ 江南（劉宜良），《蔣經國傳》（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1975年，初次在香港《南北極》雜誌連載，後經作者增補資料，重寫的版本於1983年在洛杉磯《論壇報》連載。Yueh Sheng（盛岳），*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ccount*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1).

二、初入俄鄉的學習與感情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學（一稱孫逸仙大學，簡稱孫大或中大）是蘇聯紀念孫中山，為訓練中國革命幹部所成立的大學。究竟蔣經國去蘇聯讀書是他個人的決定，還是父親派他去的一種投機行爲？迄無定論。按照蔣經國自己的說法是，他於 1925 年暑假到粵，原欲參軍，反被送到北京上學。在北京時朋友建議他去蘇聯留學。他爲了「瞭解蘇聯的政治組織」，也就由李大釗介紹赴莫。⁷ 台灣中央日報 1975 年 4 月 29 日刊載之蔣氏簡歷，則謂「十六歲時，奉蔣公之命，前往蘇俄深造，……。」⁸ 而陳潔如的外孫陳忠人說，蔣介石最初表示反對兒子留蘇，經過陳潔如不斷勸說，才讓蔣經國去蘇聯讀書。⁹ 可以肯定的是，1920 年代中期的蔣介石對蘇聯的看法，十分複雜。當時他一方面堅持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並且懷疑蘇聯幫助中國革命的誠意；另一方面，他也十分讚賞佩服蘇聯的黨政制度與組織，亟欲國民黨效法之，且有二度遊俄之念，以此爲「新生命存亡之一大關鍵」。¹⁰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他有派兒子去學習的念頭，也不爲過，談不上是什麼投機行爲。

1925 年 10 月 25 日蔣經國由上海啓程搭船赴蘇，到 11 月底，與約 179 名學生向學校報到。由於孫大老師多不諳中文，學校爲稱呼方便起見，給予每個學生一個俄文姓氏。根據 1925 年 11 月 24 日學校製作的學生名冊，當時蔣經國的俄文名字是葉里札洛夫(Елизаров)，學生證號碼 28。¹¹ 葉里札洛夫

⁷ 蔣經國在北京就讀於吳稚暉爲國民黨元老子女設立的海外預備學校，由吳單獨授課，並加習俄文，〈吳稚暉先生年譜簡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 58），卷 18，頁 61；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蔣經國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 80），冊 1，頁 66；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50，目錄號 1，卷宗號 6，頁 31ob。

⁸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 64 年 4 月 29 日，版 3。

⁹ 陳忠人，〈紀念外婆——陳潔如〉，《百姓》（香港，1983 年 6 月 1 日），期 49，頁 36。

¹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 167，460-461，539。

¹¹ 蔣經國，〈五百零四小時〉，《蔣經國先生全集》，冊 1，頁 304；〈軍政學院黨員大會〉，1929 年 11 月 2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42，頁 1-8；卷宗號 3，頁 7。

原是蘇聯革命元老馬克·葉里札洛夫(Марк Т. Елизаров)的姓。他不但是列寧的朋友，也是列寧的姊姊安娜·烏里楊諾娃(Анна Ульянова)的丈夫。蔣經國之所以用這個姓，可能只是學校任意分配的結果，並非如一位俄國記者所言，是他在 1927 年見了列寧的姊姊之後，才叫做葉里札洛夫。¹² 至於他有俄文名字尼可拉伊·弗拉基米洛維奇(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小名科里亞，Коля)則是比較晚的事。

蔣經國未去蘇聯之前，蔣介石即十分重視對兒子的教育，常常勉勵他要多讀孟子、曾文正公集、英文等，並特別要他精讀孟子。蔣介石也十分注重曾國藩家書，認為「曾氏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他若無暇給兒子回信，會指定《曾氏家書》第幾篇作為回信，囑咐仔細參閱。¹³ 到了蘇聯，即使兒子人在異鄉，對其督促，也未曾稍減。從現存於莫斯科檔案館中的幾封蔣介石寫給蔣經國的親筆家信，即可看出他對兒子教育的用心。第一封是在汕頭寫的，回答兒子赴俄途中（可能是從赤塔）寄出的信。蔣介石游俄期間曾學過俄文，可能由於深感俄文難學，¹⁴ 特別強調學習俄文的重要，他說：「既到俄國應專心學習俄語，多與俄人交接談話，少與本國人談中國話。然後俄語精通，則一切學問皆可求得。」至於英文只要溫習從前所學即可。另外也提醒兒子做人要「勤慎，格外謙和，切勿驕矜。」並寄上《曾文正公五種》一冊，希望時時翻閱。¹⁵

可能由於蔣經國沒回信或沒收到信，蔣介石復於民國 15 年 2 月 1 日從廣州寄去一信。信中除談及自己的「事業亦有進步」外，反復叮嚀兒子在俄要

¹² 據另一留蘇學生江澤民(不是現任的中共國家主席)回憶說，俄文名字是在學生報到後，由工作人員拿電話簿，參考其中俄文姓氏，依次為學生取名而來。孫耀文，《風雨五載：莫斯科中山大學始末》(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 56；瓦倫金·札以切夫(Валентин Зайцев)，“Любимая многотиражк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Тайваня”〔台灣總統喜愛的工廠報紙〕*Журналист*, Feb. 1996, no. 2, p. 42.

¹³ 《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146-148，282-283；蔣經國，〈父親怎樣教我讀書做人做事〉，《蔣經國先生全集》，冊 1，頁 160-161。

¹⁴ 《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138。

¹⁵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民國 14 年 12 月 21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80-81。

用功讀書。急切地詢問他在俄情形如何？有沒有溫習英文？有沒有看中國書？讀聽俄文能懂幾成？並要求除了要嫻熟俄語之外，還要天天留心關於經濟學政治學與世界革命的政治消息。建議兒子用看短篇報紙及小說的方式來學外語，最容易有進步。¹⁶

父親對兒子精通俄文的期望是如此殷切，那麼蔣經國的俄文到底學得如何？蔣經國在〈我在蘇聯的日子〉提到自己在1926年下半年即可用俄文對三千人的群眾發表演說；由於第一次演講的成功，此後他經常受邀用俄文對大眾演說。¹⁷ 蔣經國是否如此有語言天賦，能在短短半年的時間，便掌握難學的俄文，屢次流利地向大眾演說？翻閱檔案資料得知，他雖曾擔任過第十一班俄文書記，但於1926年9月寫信給班長和班務委員會等，表示因深感俄文學習困難，「自知俄文程度沒有直接聽講的可能」，跟不上同班同學，請求轉班。¹⁸ 蔣經國的俄文好，是離開孫大以後的事。他在孫大讀書時，校內全都是中國同學，除了上課之外，恐怕講中文的機會要比講俄文多。他寫給孫大當局的一些申請書，也是先用中文寫好，再由校方翻譯成俄文。

蔣經國的俄文學習或許不怎麼樣，但是在思想上的進步，則令其父頗為「喜出望外」。這種思想上的進步或可歸功於孫大課程之注重思想訓練與革命理論。¹⁹ 1926年2月12日蔣經國寫信給父親，對於他信中表現出「不脫離宗法社會的語意」感到不滿，並提出兩個問題：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和中國革命的性質。蔣介石3月16日的信中回道，「你的進步我以為很大。你的思想語意統統是對的。」蔣介石說，他信中的那些舊社會思想原是為試探兒子的，他沒料到兒子思想進步如此快。對於兩個問題的答覆是「一、民生主義實在是包括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歷史的中心，共產主義以物質為中心的。」「二、中國革命完全是帶有國際性的。你對於我近來演講或沒

¹⁶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民國15年2月1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4，卷宗號49，頁84-87。

¹⁷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頁69。

¹⁸ 〈蔣經國致班務委員會信〉，1926年9月9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77，頁44；〈蔣經國致十一班班長及各科書記同志〉，頁45。

¹⁹ 關於孫大課程，詳見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pp. 97-102, 116-119.

有看到。我同你說一句簡單的話。中國革命如能認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這樣革命才有意義，否則不能說是革命。你對於我的話不知以為何如？」但蔣介石在信尾也有點懷疑這些問題可能是別人要他兒子代問的。²⁰ 這似乎有點逼他表態。或曰此信可能是蔣介石基於信件會遭人審查的考慮而故意如此回答。但是，信中所言實與他當時其他言論，並無衝突之處。例如，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寫的序中，提到實行三民主義，即間接實行國際主義。「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者也。」「中國革命，不能不承認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而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矣。」他於 1925 年 12 月 20 日演講中提到「不能做世界革命黨，就不能做中國革命黨。」即使一年之後，他在晚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演說北伐經過時，也說北伐性質，「不單是中國國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東方革命的一個起點」。²¹

除了讀書之外，正值青春年華的蔣經國在莫斯科求學期間曾有一段戀情。這段感情是目前所有撰寫蔣經國早期蘇聯生活的研究著作中，從未被披露的。根據資料，蔣經國的戀愛對象是當時孫大有名的美人之一，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俄文名字涅胥達諾娃，Л. Н. Нежданова）。她是 1926 年 5 月跟隨其父馮玉祥訪蘇時，與哥哥馮弗（洪）國留在孫大讀書；妹妹馮弗伐因才十二歲多，不能入大學，結果到飛機製造廠當學徒。²² 俄羅斯現代

²⁰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1926 年 3 月 16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88-92。

²¹ 《蔣介石年譜初稿》，頁 468，483，831。

²² 1998 年初，馮弗伐接受記者訪問時，說他們兄妹三人是 1925 年底到達蘇聯，且於 1927 年回國。見王健民，〈蔣經國會苦追馮弗能〉，《亞洲週刊》（香港，1998 年 1 月 26 日-2 月 8 日合刊），頁 36。馮弗伐顯然記憶有誤。按她於十六年前為紀念其父馮玉祥，曾為文提到他們「原來是隨同繼母李德全從包頭經平地泉到庫倫。李德全在庫倫生洪光弟（已故）。父親到庫倫後，經蘇聯顧問建議，讓孩子們先走。繼母分娩之後，父親才和她到莫斯科，我們在莫斯科同父母見面。」馮玉祥夫妻於 5 月 9 日到達莫斯科，他的子女雖比他早到，但並非早到半年之久。見馮弗伐，〈懷念先父馮玉祥〉《文史資料選編》第 15 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頁 11-13。又，孫大按學生證號碼排列的名冊上記載，至 1925 年 12 月 23 日為止，共有 189 名學生註冊。1926 年 1 月 29 日註冊的鄧小平，學生證號碼是 233；馮弗能的學生證號碼是 294，馮洪國是 295，兩人的註冊日期都是 1926 年 5 月 19 日。見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42，

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存有幾封 1927 年秋天仍在孫大求學的馮弗能寫給蔣經國的信。這些信的中文極差，文意不連貫，錯字連篇。馮玉祥似乎不像蔣介石那樣重視子女教育，他的日記從未提過有關子女教育的問題。美麗活潑的馮弗能，並不愛讀書。早先她班上同學即有人認為她「不過一個小姐而已」，不認真學習，並且「主張送她回國，免耗錢與蔣經國發生關係。」學校當局對她的評語亦不佳，認為她在政治方面表現落後。²³ 她也承認自己好玩，但認識蔣經國後，受其影響不少。「如你這樣一個用功的人，合這好玩的在一塊真是不行呀！……你每次信上都勸我用功。」²⁴ 可惜的是，信函的勸說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馮弗能仍然覺得「我的住是無聊的。我一天睡的覺是很多的。除此以外，就是看小說，雖覺到沒有趣味，但是唸書是不喜歡。……」「我因為睡的太多了，玩的多了，一看書頭就痛，真是沒有出席〔息〕到極點了。（原〔中〕文如此）」²⁵

馮弗能與蔣經國之關係最耐人尋味的是在蘇聯檔案中，稱馮弗能為蔣經國的妻子。²⁶ 幾年前，俄羅斯電視台利用蘇聯檔案拍製的一部關於蔣經國在蘇聯的紀錄片《Человек Меняет Кожу》〔變換皮膚的人〕，也以馮弗能為蔣經國的妻子。但遍閱中文材料，不管是蔣介石、馮玉祥日記或其他相關研究，都沒有提到這點。比較可能的解釋是，蘇聯 1926 年通過的新婚姻法承認「事實上的婚姻」(de facto marriage); 只要有同居之事實、或共同撫養小孩、或第三者的承認，均可視為夫妻。²⁷ 不一定要向法院辦理登記之後才能算是

頁 8，12。

²³ 〈第八班對馮弗能評語〉，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118；〈孫大校長米夫致聯共中央委員會組織部〉，1928 年 1 月 6 日，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4，頁 6。

²⁴ 〈馮弗能給蔣經國的信〉，1927 年 9 月 22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115-116。

²⁵ 〈馮弗能給蔣經國的信〉，1927 年 11 月 11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119。

²⁶ 〈孫大校長米夫致聯共中央委員會組織部〉，1928 年 1 月 6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4，頁 6。

²⁷ Wendy Z. Goldman, *Woman, the State &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 Social Life, 1917-193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49。

夫妻。

如果蔣馮兩人有夫妻之實，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結婚」的？確切時間目前無從得知。但是，馮弗能於 1926 年 5 月 19 日才到孫大就讀，兩人從相識、相交到相戀，至少是該年夏天的事了。蔣馮之間產生感情，似乎是自然而發，與政治無涉。1926 年兩人認識時，蔣經國實歲只有 16，馮弗能比蔣經國小一歲，是當時孫大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兩位。年齡相仿，又是名人之後，或許是蔣馮常在一起的原因。蔣經國也許如馮弗伐所說的曾苦追她姊姊，但從馮弗能寫給蔣經國的信也可以看出來，馮弗能對蔣經國十分信賴，會將一些日常瑣事或心情變化寫信給蔣，絕不是馮弗伐所言的「姊姊不理他」。²⁸

蔣馮分手是與政治有關，但有關到何種程度，值得進一步探討。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新近解密的蔣經國檔案，提到 1927 年 7 月他寫了一份自白書宣布兩人脫離夫妻關係，並批評馮弗能思想有問題，指馮是國民黨派來監視他、影響他，想對他「加工」。²⁹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蔣經國的好友都不知道有這份自白書的存在？也不知道有無對外公布？事實上，兩人在 1927 年秋天仍有書信聯絡。而且蔣經國對馮弗能仍是一往情深，否則馮不會在信中對蔣寫道「左權〔時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就讀〕說你得了相思病。」³⁰ 蔣經國若真的寫了這份自白書，顯然是爲了應付蘇聯當局。否則他自己應該很清楚，向來對政治毫無興趣的馮弗能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影響他，或是爲國民黨工作來監視他。

根據蔣經國當時在莫斯科一位中國朋友（俄文名字爲帕以可夫，Пайков）的信，1927 年 12 月蔣經國去列寧格勒求學後不久，便與馮弗能斷絕關係。蔣經國的朋友一般都反對他與馮弗能交往，主要的理由似乎是蔣是共青團團員，馮不是。因此當他們得知蔣經國決定與馮斷絕關係，都感到很高興。他們原先希望蔣經國能早日與馮斷絕關係，蔣卻一直猶豫不決。直到

²⁸ 王健民，〈蔣經國會苦追馮弗能〉，《亞洲週刊》，頁 36。

²⁹ 謝忠良、王健民、童清峰，〈KGB 檔案重繪青年蔣經國〉，《亞洲週刊》（香港，1998 年 1 月 26 日-2 月 8 日合刊），頁 30-33。

³⁰ 〈馮弗能給蔣經國的信〉，1927 年 9 月 22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116。

寒假，蔣回到莫斯科，看到了「事實的真相」，才決心與馮斷絕關係，並且打算發表一封公開信。從帕以可夫這封信可知，直到 1927 年年底至 1928 年年初，蔣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曾發表過與馮弗能有關係的公開信。到底蔣經國回莫斯科後看到了什麼，促使他決定與馮分手？蔣經國最後是否真發表了公開信？這些都是目前無法解答的疑點。帕以可夫在信中頗讚賞蔣的表現，他說「我很欣賞，我底朋友，我底同志——你，竟有怎樣大的決心與毅力去決定本人將來的命運。自然，這種的斷絕是不免令當事人感受痛苦，然而我無條件的以為這種斷絕是十分正確的事。」「和馮結合無條件是錯誤的。希望她有一天會變成共產主義者。……你說此後要少談話、多讀書，我以為固然也是一個消悶的方法，然而如果性的要求急，我以為你也〔不〕妨另找她人。」³¹ 由此亦可見當時學生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影響，以為黨員與非黨員交往是不適當的。

事實上，蔣經國曾經寫信勸馮弗能加入青年團，但是馮弗能一直沒有行動。她的哥哥馮弗國在政治上倒是比妹妹積極，於 1926 年秋天即加入共青團。³² 馮弗能要到蔣介石清黨後，迫於情勢，感到再不表態，恐怕難以生存的情況下才有所行動。1927 年 9 月下旬她將申請加入少共的草稿，寄給蔣經國看，並尋求改進意見。她自言過去對政治沒有覺悟，所以沒有加入共青團。現在「學校一切的生活差不多都完全是政治化了」，若不參加政治工作，亦別無出路，所以願意入團學習。³³ 以她這個對政治向來不感興趣的小姐都得考慮加入黨組織，亦可見當時受到多大的壓力。但申請似乎沒有結果。

孫大的修業年限，最初預定為兩年。蔣介石於 1927 年 2 月 1 日即在信中對蔣經國表示「你今年畢業，我不望你回來，仍在蘇聯繼續學習可也。」³⁴ 清黨之後他是否仍維持初衷，不得而知，但這封信至少反映出他一度希望兒子

³¹ 〈Пайков 給蔣經國的信〉，1 月 8 日（由信內容推測為 1928 年），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93。

³² 馮弗國認為要徹底革命，非從無產階級不可。介紹他入團的是姜餘麟。1926 年 9 月 25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123。

³³ 〈馮弗能給蔣經國的信〉，1927 年 9 月 24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101。

³⁴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83。

繼續留在蘇聯讀書。根據蔣經國於 1936 年所寫的履歷表，他在 1927 年 2 月，被蘇聯當局派到莫斯科一所軍校特別班當學員。³⁵ 只是他的學籍仍在孫大，並時常回校參加活動。³⁶ 孫大當局於 1927 年春天即已開始籌畫、安排第一批畢業生的出路。計有三種：一是再上一些關於黨政建設的討論課程；一是上兩個月軍訓；一是上軍校，過去只有國民黨右派才能被派到高級軍校讀書與訓練〔為拉攏國民黨而訂的政策〕，現在則加送共產黨團員。³⁷ 孫大送往軍校讀書的第一屆畢業生名單中便有蔣經國的名字。³⁸ 1927 年孫大有 79 位畢業生加入共產主義東方勞動者大學暑假軍訓營，蔣經國亦是其中之一。³⁹ 結訓後，軍訓營主任以蔣經國政治立場不堅定為由，建議不要派往軍校就讀。⁴⁰ 蘇聯當局顯然沒有接受這項建議，因為同年 12 月他便到列寧格勒湯爾馬喬夫(Толмачев)軍事政治學院讀書。

清黨之後，國民黨學生並沒有馬上被送回中國，截至 1927 年 11 月 19 日前為止，孫大只剩約 50 名國民黨學生，其中又有一半學生打算加入共青團或黨。⁴¹ 至於馮氏兄妹，校方雖視為累贅，仍建議將其扣為人質，不讓他們回

³⁵ 見蔣經國於 1936 年 11 月 16 日為申請成為蘇聯共產黨正式黨員所寫的履歷表。刊載於拉林(А. Ларин), “Президент Цзян Цзинго в бытность его Н.В.Елизаровым и после”〔蔣經國總統以葉里札洛夫為名之時與之後〕一文的附錄“Анкета”〔履歷〕,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今日亞洲與非洲〕1991, no. 8, p. 55。在履歷中蔣經國並沒有寫明哪一所學校。據新解密的檔案，蔣經國是到蘇聯軍事情報局特種學校就讀。謝忠良、王健民、童清峰，〈KGB 檔案重繪青年蔣經國〉，《亞洲週刊》，頁 33。

³⁶ 根據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正式紀錄，蔣經國於 1927 年 8 月 5 日離開該校。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42，頁 5。

³⁷ 〈孫大致聯共中委會鼓動宣傳部與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1927 年 3 月 16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19，頁 129-131。

³⁸ 〈孫大二年級學生派往軍校讀書名冊〉，1927 年，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23，頁 4。

³⁹ 早在 1927 年年初，孫大當局即欲利用暑假，給予學生較長的軍事訓練，因籌辦不及，直到 1928 年夏天才開辦。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10-113.

⁴⁰ 〈孫大教務主任阿戈爾 Агол 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函〉，1927 年 6 月 14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19，頁 52；〈東方大學夏令軍訓營主任致工農紅軍第四司令部函〉，全宗號 532，目錄號 1，卷宗號 415，頁 12ob。

⁴¹ 〈孫大會議記錄，No.11〉，1927 年 11 月 19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

國。⁴² 但不到兩個月，不知為何原因，蘇聯當局已為他們準備簽證離蘇。馮氏兄妹便於 1928 年 5 月 25 日啓程返國。⁴³

蔣經國是否也有回國的打算？根據他自己後來的說法是四月畢業之後，他要求回國，沒被批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認為我回國比留在莫斯科對共產主義的擴張更不利」。「有些黨員對我說：『我們要你留在蘇聯繼續你的學習和實踐。』」他們認為假若蔣經國獲准返國，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要把他留在蘇聯。⁴⁴ 事實上，蔣汪清共之際，中共並無正式代表團在莫斯科，而且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對蘇方有點影響力或發言權，至少是在 1928 之後。蔣經國的這番話，難以令人信服。再者，那時候更不可能單憑「有些黨員」的話，來決定他未來的動向；即使是王明都不可能。王明之引起第二任孫大校長米夫(Павел Миф)的注意是在 1927 年春陪同他到中國訪問，擔任他的翻譯才開始。王明在該年夏天回蘇之後，因為學校的教務派與黨務派之爭而嶄露頭角。⁴⁵ 即使如此，當時他在蘇聯當局心目中對中國事務的發言權，也還不像 1930 年代初期那樣達到一言九鼎的地位。綜而言之，衡諸當時情況，蔣經國能不能回中國，自然不完全由得了他自己作主；蘇聯當局也可能要拿他當人質。不過，也不該忽略另一種可能性，亦即他到達蘇聯後，發展出的日益左傾的言行，所以認為父親「背叛」革命，暫時不願回國。

同學們都公認蔣經國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的學習好，理論也不壞，對中國問題還能理解。清黨後，他的政治立場引人側目，令人懷疑，既然一時不

卷宗號 26，頁 116об；詳細情形參閱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78-83.

⁴² 〈孫大校長米夫致聯共中央委員會組織部〉，1928 年 1 月 6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4，頁 6。

⁴³ 〈孫大校長米夫致 АОМС 外事處與國家政治保安局〉，1928 年 2 月 20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34，頁 25；〈孫大秘書帕谷聊耶夫 Погуляев 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函〉，1928 年 5 月 28 日，頁 45。

⁴⁴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頁 71。

⁴⁵ 教務派與黨務派之爭發生於 1927 年。孫大教務主任阿戈爾(Агол)與孫大總支部委員會書記謝德尼可夫(Седников)不合，兩人以拉攏學生來培植自己的勢力。該年春末夏初，孫大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副校長米夫訪華，校內權力真空，兩人爭權愈烈。直到米夫返國，王明利用第三派，才打敗兩派。

能回國，因此致力於學業，也是唯一可行、積極進取之道，甚且是求生自保之道。他在學業方面的表現要比當時的一些名人之子，如馮弗國、邵志剛（邵力子之子）之類好多了。在軍政學院兩年之後，蔣經國又再度面臨何去何從的難題。他對於可能回國是欲迎還拒。他曾對同學說，「我們快回去了。但我又不能做工。你們工人同志可以找到工作。」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被允許回國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要求畢業後派他去工廠實習或去作群眾工作。當時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瞿秋白同意他暫留蘇聯一年，到蘇聯工廠工作。1930年1月9日，鄧中夏以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代表身分，在軍政學院主持特別班支部會議，也討論到蔣經國畢業後的去留問題。鄧中夏發言，「看不出他有何毛病，不能因他父反革命而有別的見解，但他暫時留蘇聯，讓他參加生產，是對的，不必派回去，但須此地決定。」一位學生認為蔣經國在校學習不錯，如果他非「階級敵人之子」，一切好辦。但因他是「敵人之子，利用他作翻譯，益處少。最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其他幾位學生也附和說，他從來沒有工作經驗，應派他到工廠工作，參加黨的工作，以審查其行動。⁴⁶ 結果決定派他到工廠實習兩年。⁴⁷

1930年7月蔣經國自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畢業後，便到莫斯科郊區的狄拿馬(Динамо)電氣廠當了近一年的鉗工。從1931年5月到11月轉往莫斯科州(область)一集體農場工作。1931年11月至1932年10月在莫斯科的國際列寧學校(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Ленинская Школа)作研究生。⁴⁸ 1932年11月起，到烏拉爾山附近斯維德洛夫司克城(Свердловск，今改名凱薩琳堡Екатеринбург)的重型機械廠當技師。從此結束了他在蘇聯的求學生涯，進

⁴⁶ 〈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特支主席團第十四次會議記錄〉1930年1月9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50，目錄號1，卷宗號6，頁18-21，56。

⁴⁷ 〈列寧格勒軍政學院清洗黨員委員會關於清洗黨員的總結會議〉，1930年4月30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50，目錄號1，卷宗號10，頁39。該會對蔣經國所做的結論是「按第三類別留在黨內，密切注意他承認自己過去（托派）的錯誤的誠心不足。」按第三類只留在俄國的西伯利亞、烏拉爾山、頓巴次煤礦的工人群眾工廠。1930年4月18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4，卷宗號49，頁67。

⁴⁸ 蔣經國，“Анкета”〔履歷〕，*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今日亞洲與非洲〕，1991，no.8，p. 55.

而步入了他人生中更艱苦的另一階段。

三、蘇聯求學時期的政治生活

蔣經國赴蘇之前，曾因參加五卅示威而被捕，可見他也是一熱血青年。年少不免氣盛，對於當時中國的情境，任何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少年會嚮往投身革命事業，也是稀鬆平常的事；何況蔣經國在這方面還會受到父親的鼓勵！蔣介石在家信中期勉其子成爲一個「有魄力、有見識、有學問、有勇氣、強幹精明之革命家，以繼吾黨之後也。」「你既在俄必能認識現在時勢與潮流，凡事總要向上求祈，尤須重視民眾利益，犧牲個人一切幸福，爲國際無產階級求解放是第一務也。」因此，蔣經國在校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且於 1925 年 12 月即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蔣介石也不介意兒子加入共青團，重要的是團體需具革命性。「你於入何黨，隨你所願，余不限制，但說要革命急進，有革命性之團體爲重也」。⁴⁹

劉宜良說「很多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到了莫斯科後，降爲候補，經國輕易地納入組織，第三國際東方部的特殊青睞，拆開來看，別有用心。」⁵⁰ 這句話只說對了前面一半。當時蘇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確有歧視。中共正式黨員，轉成蘇聯黨員，只能成爲候補。但是蔣經國並沒有立即加入蘇聯共產黨，當時他加入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到了 1926 年才轉爲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ВЛКСМ)。⁵¹ 還要經過若干時間，才能成爲聯共候補，然後可能成爲聯共正式黨員。以蔣經國當時對革命的熱衷，成爲團員，不見得是「特殊青睞」。何況當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權勢也還沒有完全穩固，不該把 1925 年與 1927 年的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地位與蘇聯當局重視他的程度混爲一談。

⁴⁹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1926 年 2 月 1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86-87。

⁵⁰ 劉宜良，《蔣經國傳》，頁 45。

⁵¹ Alexander Pantsov, "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in Soviet Russia (Part 2),"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April 1994), vol. 30, No. 4, p. 59.

在一份孫大學生入學填寫的俄文打字表格上，蔣經國填寫自己在 1925 年 10 月加入國民黨。⁵² 蔣經國回國後也說過在離滬之前，經國民黨元老林業明（煥庭）介紹入黨。⁵³ 奇怪的是，蔣介石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出國前夕已加入了國民黨！在他知道兒子加入共青團後，曾寫信說「你從前未入國民黨，今既加入了共產黨，你就拿共產主義為你的事業，你拿革命為你的生涯。我雖然未加入共產黨，而為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我自認我一生的事業是在革命。所以我們父子兩人始終是立在革命戰線奮鬥的。我對於你名稱雖為父子，在革命上說起來是一個同志，我實在是很滿足的。」⁵⁴

加入國民黨的蔣經國，在莫斯科卻甚少參與國民黨活動，反而與左派往來頻繁。俄羅斯文獻中心關於孫大國民黨及其所屬機關名冊與國民黨同志工作調查表中，找不到蔣經國的名字。孫大國民黨旅莫支部實際上雖受共產黨員控制，但校內堅決反共的國民黨籍學生（孫大中共黨員稱其為極右派）名義上仍在支部擔任重要職位。例如，唐健飛任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楊可大組織部副部長，劉詠堯副宣傳部長，白瑜任監察委員會主席，鄧文儀任書記等，而蔣經國在其中沒有一官半職。⁵⁵ 蔣經國也沒有參與這些右派學生為對抗被中共黨員操縱的公開會議而私下舉行的秘密集會。⁵⁶ 目前筆者唯一看到蔣經國參與國民黨黨員大會的紀錄，是在蔣介石清共之後。他在會議中附和俞秀松的批評，指摘在莫斯科的國民黨宣傳部，不注意中國國內的政治問題。⁵⁷ 蔣經國在孫大往來甚密的朋友，如俞秀松、劉鳴先、盧貽松等人，

⁵² 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14，頁 54。

⁵³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頁 66；〈記事年表〉，《蔣經國先生全集》，卷 26，頁 28。

⁵⁴ 〈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信〉，1926 年 3 月 16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91-92。

⁵⁵ 〈國民黨及其所屬機關名冊〉，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2，卷宗號 42，頁 41，44。

⁵⁶ 白瑜，〈有關留俄中山大學〉，《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蹕勵》（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民 77），頁 46-49；李雲漢，〈革命黨人王仲裕的生平〉，見前書，頁 455。關於孫大國民黨旅莫支部的詳情，見 Miin-ling Yu,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p. 183-188.

⁵⁷ 〈宋廉、吳近、唐玉焜、蒲秋潮、傅鐘、徐世義致孫大聯共總支部委員會函〉，1927

都是共產黨團的成員，也可能因此促使他的思想有日益左傾的趨勢。到他父親清共時，會認為父親是革命的「叛徒」，未必是違心之論。

從記錄上來看，蔣經國積極參與學校各種活動。他先後擔任過孫大俱樂部書記兼副主席，俱樂部政治委員會主席，收集中國青年材料委員會委員，俱樂部活動組組員，少共小組宣傳部特別委員會的印刷委員。⁵⁸ 他的歷任少共小組長咸認他是個「對黨有相當認識」，努力工作、做事認真的人。他的組長之一高維翰則指出他的缺點是「脾氣不好，隨便說話」。⁵⁹ 有一次開會，蔣經國與小組長因故爭執不下，次日他寫了一封信，說同學指出他的錯誤有：「1.在會場中搗亂；2.在課堂中搗亂；3.不注意功課；4.忘記積極份子的責任」。他坦承自己「個性強，不能有計畫學習」。請求為他指出一條路。⁶⁰ 無論蔣經國的坦承認錯的態度是否出自真心，仍可說明蘇聯訓練黨員所採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孫大黨部對蔣經國的評語是「教育中等，有訓練的馬克斯主義者，守紀律，十分活躍。由於年青，輕率冒失。」⁶¹

當時與蔣經國同校不同班的鄧小平，比蔣經國晚兩個月到達蘇聯。由於鄧小平在法國即是活躍的共產黨員，他來到孫大進入特別的第七組——「理論家小組」就讀。⁶² 如果我們比較蔣經國與鄧小平在孫大的表現，可以發現兩人都是黨團中堅份子。鄧在黨團中更活躍。他不但是少共小組組長，也是組織部委員，職司考核中堅份子。⁶³ 他也是黨、組員調查表表格、報告等填

年6月26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41，頁25。

⁵⁸ 〈黨員及團員工作調查表〉，俄文獻中心，1926年11月12日，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20，頁9；〈團員分析表〉，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23。

⁵⁹ 〈組長報告〉，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22；卷宗號125；〈黨員及團員工作調查表〉，卷宗號20，頁9；卷宗號38。

⁶⁰ 〈蔣經國給少共委員會組織部的信〉，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25。

⁶¹ 〈孫大聯共支部書記席特尼可夫 Ситников 給蔣經國的評語〉，1926年，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14，頁55。

⁶² 這個小組的中共黨員有鄧小平、傅鐘、李卓然等，國民黨員有谷正鼎、谷正綱、鄧文儀，還有汪精衛的侄子和秘書、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按鄧小平的說法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尖子人物都在一個班組。」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民82），頁120。

⁶³ 〈團員分析表〉，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123。

寫得最詳細、最確實的極少數小組長之一。孫大校黨部對鄧的評語是：「非常活躍與精力充沛的黨團員。是孫大少共支部最優秀的組織者之一。是一個守紀律、信仰堅定，同時對學習也頗具天份的人」；能「從自己在少共支部組織工作中吸取許多經驗，進步很快。參與一般工作積極，與同志的相互關係也很好。功課也是第一名」；並建議「從事組織工作最適合。」⁶⁴

蔣經國與鄧小平都在台海兩岸威權統治最盛期結束後，接掌政權，在施政上逐漸鬆綁，走向各種程度不同的改革。他們兩人都是十六歲出國。兩人在國外的學習與生活經驗對他們後來施政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議題。蔣經國在出國之前，即參加反對北京政府的示威遊行，可見他對國事的關心。鄧小平則不然。據其自述，在他十六歲出國之前，「生活浪漫」，「不喜讀書更是我的特長」；直到去了法國，才逐漸介入政治活動；出國兩年餘（1923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而加入的動機是爲了趕時髦；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鄧於1926年初（1月29日？）從法國到蘇聯，先在東方大學待了12天（當時他的中文名字是鄧希賢，俄文名字是克列佐夫，Крезов），然後轉往孫大（俄文名字是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學生證號碼233）就讀。鄧小平在孫大的自傳中寫道，赴俄動機是在西歐工作時，「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來俄是爲了努力研究共產主義，「務使自己對共產主義有相當認識」。⁶⁵ 他參與黨務不遺餘力，到蘇聯後即成爲聯共候補，於1926年10月申請轉爲正式聯共黨員。⁶⁶ 似乎未獲通過之前，鄧已束裝回國。蔣經國比鄧小平小五歲，在黨務方面的磨練與表現，在當時自然比不過鄧小平。但他認真學習，也虛心求教，卻在他積極投入政治活動之時，突然傳來父親清共的消息。

1927年4月12日發生的蔣介石清共，對絕大多數的孫大學生來說，無異是晴天霹靂。這時在政治立場上最尷尬的莫過於國民黨名人之子女，其中

⁶⁴ 〈孫大聯共支部書記阿戈爾給鄧希賢的評語〉，1926年11月5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1，卷宗號14，頁770b。

⁶⁵ 〈鄧希賢中文自傳〉，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5，頁166-176。

⁶⁶ 〈鄧希賢致孫大黨支部委員會〉，1926年10月19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495，目錄號225，卷宗號1629，頁8。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叛徒之子」蔣經國了。他在那篇被蘇聯塔斯社廣為宣傳的聲明中說：「蔣介石的叛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的談論革命時，他已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希望與張作霖和孫傳芳妥協。蔣介石的革命生涯已經結束。作為一個革命份子，他已經死了。他已成為反革命份子，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到反革命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⁶⁷ 5月4日蘇聯當局派馬爾丁諾夫(A. C. Мартынов)到孫大的黨團員聯席大會(共有420人出席)演講〈中國革命的前景〉，為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失敗辯護。其後數天由出席者針對當天的演講進行分組討論。蔣經國在會中激烈指責馬爾丁諾夫的報告，說馬爾丁諾夫是國民黨右派，因為他沒有指出蔣介石是叛徒。⁶⁸ 繼蔣經國之後，葉南(葉楚傖之子)、邵志剛、馮弗國也都先後發表類似聲明，但當時同學們認為馮、葉等是不得已的仿效，而蔣經國則是真心的，他一時成為同學敬愛的人。⁶⁹

「蔣介石曾是我的父親和革命朋友。」蔣經國確實曾將其父視為「我的革命朋友」。父親過去的家信不是曾經鼓勵他要為革命奮鬥，為求解放國際無產階級而努力嗎？類此話語，言猶在耳，父親卻在行動上一下子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他一時不知所措，也可能讓日漸走向革命、相信共產主義的他，因為父親這種「叛變」，異常憤怒(這也是對他個人的「叛變」。)此時又正值青少年最容易反抗父母的時期，因此，他言語方面對蔣介石的攻擊甚至要比其他人還激烈。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自己特殊的身分，不這麼做，也很難在蘇聯生存。那一連串的聲明與指責，也可能同時是不得不為之的求生手段。早先學校、同學對他在黨務工作方面的表現，即使職位不高，仍受到相當肯定，孫大黨部也承認他在思想上是個馬克斯主義者。而離校前，東方大學軍訓夏令營主任對他的評語則變成「政治

⁶⁷ *The People's Tribune* (Hankow), April 24, 1927, 轉引自 Yueh Sheng 一書，頁 122。

⁶⁸ 〈馬爾丁諾夫報告分組討論〉，1927年5月8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25，頁15。

⁶⁹ 何漢文，〈記留俄學生〉，《湖南文史資料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三集，頁153；邵志剛是在5月31日聲明與其父脫離關係。〈邵志剛聲明〉，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42，頁52ob、92。

上不堅定。猶豫不決。需要長期特別的政治監視。」⁷⁰ 清黨之前對蔣經國政治方面表現的肯定之處，到了清黨之後全變成否定。

這種完全負面的評價，對蔣經國過去的努力無疑是一嚴重打擊，也造成他日後在政治活動上很大的壓力。所以他在莫斯科國際列寧學校求學時，每逢支部開會討論，便近乎機械式地發表冗長的言論，痛心疾首地譴責父親背叛「三大政策」。⁷¹ 由此也可以想像當時他所遭受的壓力有多大，也因此他的發言有越來越激烈的趨勢。到了 1936 年年底，蔣經國在申請成為正式聯共黨員的自傳上，不但堅定地說他自己已和蔣介石公開地斷絕各種關係，而且還說「如果將來有機會碰到蔣介石的話，我會像每一個共產黨員那樣，給他和他的黨羽嚴酷的懲罰。」⁷²

中國學生對於蔣介石的「叛離革命」，雖然感到十分憤怒，倒沒有將這種情緒完全轉嫁到蔣經國身上。有不少同學認為清黨後的「政治面目不明顯」，是一般現象，不是蔣經國獨有的特殊現象。⁷³ 他們比較介意的反而是蔣經國與托洛斯基派的關係，他的政治思想是否「正確」，比較重要。

孫大的第一任校長拉狄克(Карл Радек)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孫大成為中國托派大本營，亦不足為奇。蔣介石清黨之前，校內的托派份子，僅停留在學術討論，即理論層次之爭；到了清黨之後，才因史大林、托洛斯基對華政策之爭，而在孫大升高成政治問題。蔣經國受到拉狄克及其他校內托派老師等人影響，而成為托派。至於他是何時成為托派，目前並不清楚。他在托派組織的角色，主要是散發傳單，⁷⁴ 算是這組織的邊緣人物，並沒有同

⁷⁰ 這是孫大於 1927 年 8 月，將蔣經國的資料移轉到列寧格勒軍政學院時，對他的評語。〈東方大學夏令軍訓營主任致工農紅軍第四司令部函〉，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2，目錄號 1，卷宗號 45，頁 12ob。

⁷¹ 周焱、王景泰、陳謙、譚秀珍，《陳郁傳》（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頁 113。

⁷² 蔣經國入黨自傳，刊載於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今日亞洲與非洲]，1991，no. 8，p. 55。

⁷³ 〈軍政學院特支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速記錄〉，1929 年 10 月 21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1，卷宗號 6，頁 20ob。

⁷⁴ Alexander Pantsov, "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pp. 58-60, 63.

學將他視為他回國後自稱的「托派領導人」。⁷⁵ 這點我們也可以從學校當局開除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遊行的托派學生名單中並沒有蔣經國看出來。⁷⁶ 至於他退出托派則是在蘇聯第十五次代表大會（1927年12月2-19日）之後。他退出的時間，頗引起同學們的非議。當他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要申請成為聯共候補時，即有同學認為他在校長拉狄克被蘇共開除後才退出，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不堅定，有投機的味道。蔣經國答稱那時他人在莫斯科，還沒有覺悟。⁷⁷

蘇聯革命之後，生活的各個層面本來即有日漸政治化的趨勢。對中國學生而言，蔣介石清共後，連生活渾渾噩噩的馮弗能都感覺到「學校生活完全政治化了」，更別提真正涉獵政治活動的人了。說明這種泛政治化的最好例子就是江浙同鄉會事件。雖是子虛烏有的事一樁，卻牽連甚廣，幾乎弄得當時所有中國留蘇學生都不能好好安心讀書。若要詳述江浙同鄉會的前因後果，全部經過，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處理。⁷⁸ 在此只談與蔣經國有關的部分。1928年春天，孫大校內傳說有反黨組織「江浙同鄉會」，此時蔣經國人雖已在列寧格勒讀書，卻被指為其中領袖之一。密告信滿天飛，弄得全校沸沸揚揚，人人自危。最後蘇聯共產黨監察委員會不得不出面調查。江浙同鄉會與國民黨右派有關係的謠言來自蔣經國收到母親寄來的錢。實際上，蔣經國這錢是1927年4月以前收到的；他借給一位同學朱茂榛40盧布去鑲牙，剩下的錢用來請同學吃中國飯。⁷⁹ 由於吃飯的時間大約是在1927年夏天，就有人誤認為有個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的團體隱然成型，繪聲繪影的勾勒出許多不軌陰謀。江浙同鄉會是被捏造出來的另一證明是日後在留蘇中國學生或中

⁷⁵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頁70。

⁷⁶ 〈孫大會議 No.9 記錄〉，1927年11月9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2，卷宗號26，頁108-110。關於托派學生的活動詳見 Alexander Pantsov, "From Students to Dissidents", pp. 3-5.

⁷⁷ 〈軍政學院黨員大會〉，1929年11月2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550，目錄號1，卷宗號6，頁31-ob；32。

⁷⁸ 可參閱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期3，頁193-219；期4，頁213-241，收入氏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86），第一編，第四章。

⁷⁹ 〈郭景淳、胡世杰、劉仁壽、朱茂榛、周策致中共代表團說明書〉，1928年3月15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495，目錄號154，卷宗號343，頁46-48。

國共產黨的無數次政治鬥爭中，江浙同鄉會始終未見成爲一項指控的罪名。

江浙同鄉會事件平息之後，對蔣經國而言，在軍政學院的政治大事莫過於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了。在莫斯科檔案館中還留有一些當年討論蔣經國入黨會議的速記錄資料，非常寶貴。

從 1929 年 2 月開始，蔣經國數次提出入黨申請，並根據黨章，尋得五位黨員作爲介紹人：福德采夫(Фодцев)、科京(Котин)、勾傑思(Годес)、科塔維奇(Котавич)、斯杰培金(Степыкин)。每次經過討論之後，都決定暫緩。同年十月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特別班支部，再度討論他的案子。蔣經國的好友，也是共產黨員的劉鳴先指出根據聯共新章程，五位介紹人中，至少必須三個是工廠工人。他不反對蔣經國入黨，但他的介紹人不符合規定，恐將在全校和黨部開會時發生問題。大多數人因爲蔣經國對工作、對人表現良好，都贊成他入黨。有一、兩人比較擔心的是他的「政治面目」不明顯。且另有人主張此案暫時保留，因爲他在中國鮮有從事實際工作的經驗。介紹人之一勾傑思補充說，是否允許入黨，「應估量和相信這個人是否能爲無產階級而戰。至於葉里札洛夫當然他的出身不同，但他不是小孩子。我們既認爲他是一個好同志，但不應把他放在黨外訓練。」蔣經國說明道：「我同誰一路走：是同家庭或共產黨，這問題早已決議。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聯共，這是秋白同志同意我暫時爲候補黨員。其次我將來回國問題，秋白同志也同意我暫留此一年學習工作，在工廠內。我並不是怕回去。關於政治問題，在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ЦКК)有文件。」最後劉鳴先說「我知道葉里札洛夫最久。我是同他由上海一路來莫。同時在孫大經過兩年。我知道他的共產主義發展是很快的。因此很快（原文如此），所以在過程中發生許多錯誤，結果犯了反對派的錯誤。在十五次大會後，他寫了意見到黨部承認他的錯誤。在軍政學院兩年多，過去的錯誤觀念是沒犯過的。」決議的結果是四人贊成蔣經國爲候補黨員，一人反對。通過向學校黨員大會提交討論。⁸⁰

到了 1929 年 11 月 2 日學校召開黨員大會，劉鳴先首先報告說：「蔣經

⁸⁰ 〈軍政學院特支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速記錄〉，1929 年 10 月 21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50，目錄號 1，卷宗號 6，頁 6об，18-21。

國在十月十六日要求入聯共候補黨員，在特別班主席團已決定他入聯共候補黨員。其陳說書另詳。」接著由大家提問題，歸納起來有下列幾個：1.若黨要調蔣經國回去，是回還不回？2.如何對待蔣介石？與父親的關係為何？回去後還與家庭發生關係否？3.與反對派（即托派）關係如何？為什麼在履歷上不寫參加反對派的行動？

蔣經國重申曾與瞿秋白談過，瞿要他在蘇聯作半年工。「若黨要我回，我當回去，並在黨的指導之下。對蔣介石當然是仇人。俄同志介紹我，當然知道我。關於反對派，我很抱漸〔歉〕。因我不是普羅階級出身，當然有很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所以不知覺的與反對派發生關係。同家庭一點關係都沒有。同李大釗的關係，我來是他介紹我來莫。為什麼那時不加入少共，因我那時才十五歲，在國內完全是小孩子。」另外又說「就是我非無產階級出身，我是很幼稚的，很年青。同志們，在以後還有兩年的候補期，可以看見過。」

大家對他誠實地回答一切問題，均感滿意，同意他成爲聯共候補。但提醒他要記得自己說過的話，且應重視政治問題。希望他不可太應付，不要做過場。並建議由於蔣經國沒做過實際工作，黨應多給工作，用候補期考察他。結果以多數票通過蔣經國爲聯共候補。⁸¹ 從會議速記錄來看，整個討論過程十分理性，沒有意氣用事或人身攻擊。這是上級交代的，還是自發的？耐人尋味。1930年3月28日列寧格勒城軍區委員會同意通過他的聯共候補黨員資格。⁸²

四、結 論

蔣經國在〈我在蘇聯的日子〉寫說，他「抵達蘇聯之後，實質上就成了被他們脅持的人質」。這句話與實際情形不全吻合。從俄國檔案文件看來，

⁸¹ 聯共黨員 12 票，中共黨員 25 票贊成；1 票反對。〈軍政學院黨員大會〉，1929 年 11 月 2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50，目錄號 1，卷宗號 6，頁 31-32。

⁸² 〈劉鳴先致鄧中夏函〉，1930 年 3 月 29 日，俄文獻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頁 62。

蔣經國剛到蘇聯的待遇和其他同學並無不同，不僅沒有負面的「特殊待遇」，也沒有因為他是蔣介石之子而享受正面的「特殊待遇」。至少在 1926 年下半年北伐之前，蘇聯當局看重的是馮玉祥。所以 1924 至 1926 年蘇聯已撥與預撥給馮玉祥的軍事武器，幾乎是廣州政府的兩倍，這還不包括岳維峻、張之江等其他國民軍將領所需的軍援總額。⁸³ 如果說真有所謂特殊待遇，其對象也有可能是馮玉祥的兒子馮弗國。但是也沒有資料顯示馮弗國因為父親的關係享受不同於一般學生的待遇。如果蔣經國成為人質，那麼最早也是 1927 年 4 月清黨以後的事。在這之前，他所受的待遇與一般學生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莫斯科檔案與蔣經國回國後對蘇聯的記述有許多出入，尤以〈我在蘇聯的日子〉為明顯。1937 年春天，蔣經國回國，隨後在家鄉奉化溪口停留並撰寫留俄回憶錄。目前所見的留俄回憶錄有兩種版本。一是〈我在蘇聯的日子〉，一是〈我在蘇聯的生活〉。兩者無論形式或內容均截然不同。〈我在蘇聯的生活〉，形式上是將他在蘇聯的十三年，每年挑出一天來寫，共有 13 篇。內容平鋪直敘，對蘇聯不出惡言，甚至還敘述了許多窮人翻身或讚揚蘇聯建設的故事。蔣經國對於自己所居角色的描述也是中立的，他只是一個事件或聽聞的記述者，負責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而已，沒有加上太多的價值判斷。讀來讓人覺得可信度較高。其中的一篇，即 1925 年 12 月 3 日那一天的日記，曾於 1939 年 6 月刊載於上海的《雜誌半月刊》。⁸⁴

〈我在蘇聯的日子〉〔又名〈冰天雪地〉〕，最初以附錄形式見諸於克萊恩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一書。⁸⁵ 時間比〈我在蘇聯的生活〉晚上市四、五十年。它在形式上是將在蘇聯的十三年分為六部分來敘述，所呈現的

⁸³ 余敏玲，〈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1923-1925〉，《中國現代史專輯研究報告》，第十八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中心），頁 644-647，655。

⁸⁴ 雜誌編者按，「蔣經國先生在蘇聯十三年，八一三以後，返國參加抗戰工作，最近將其十三年日記整理，在每一年中抽出一天，輯成《十三年》一書，這裏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天的日記：現行刊出，以饗讀者。」蔣經國，〈孫逸仙大學〉，《雜誌半月刊》（上海，民國 28 年 6 月 1 日），卷 4，號 6，頁 51-54。全文曾由上海前鋒出版社於 1947 年出版。《蔣經國先生全集》，冊 1，頁 90。

⁸⁵ Ray S. 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蔣經國是一個不畏強權〔史大林〕，具有領導才能、寫作、演講、俄語天賦的人。其中言過其實之處頗多。〈我在蘇聯的日子〉充滿了對蘇聯負面的批評。這些批評是過去反共抗俄時期教科書上常見的用語，讀來頗有政治宣傳的味道，令人感到更難採信。

現有的資料顯示，〈我在蘇聯的日子〉與〈我在蘇聯的生活〉極可能是一本回憶錄，後來因為需要，拆成兩篇文章。理由有三：1.蔣經國在〈我在蘇聯的日子〉前言中寫道，他在溪口住了七個月，將「在蘇聯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回憶錄，並且取了個書名叫做〈我在蘇聯的日子〉。」⁸⁶2.蔣介石於1937年5月12日寫給兒子家信中，特別提到留俄報告不必等全部寫完再呈閱，可以每寫完一段即呈。因此他於6月4日的另一封家信中，對兒子說「兩部報告皆已閱畢，感慨殊多。」此處的「兩部報告」實指先後寄來寫完一段落的報告。3.按常理推斷，一個人旅居國外多年，很難在回國不到半年的時間內，能十分理智地將旅居國的正反兩面印象與心得，涇渭分明地分別寫在兩本報告中。比較有可能的是從同一本回憶錄中將正反兩面的心得與印象抽離出來，分別寫在兩個本子上。

假如旅俄回憶錄原來只有一本，下一個問題自然是為何會有或需要兩種不同面貌的版本出現？要回答這個問題，也需解答另一問題，即最初蔣經國寫的報告是用俄文還是中文？因為翻譯可能會涉及「加工」的問題。由蔣父7月24日寫給兒子的信指出，「旅俄報告請人不如自譯，以自己不能自著國文，反要請人來譯國文，亦一恥事也。惟待國文著成後，可請一懂俄文者修正則可也；我正代覓中，將來當介紹來家相見。」⁸⁷蔣介石自然不能讀俄文，所以蔣經國最初呈上去的報告應是請人速譯成中文，轉交其父。其後出版的〈我在蘇聯的生活〉中文則已經過潤飾。⁸⁸

⁸⁶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頁63。

⁸⁷ 蔣經國，〈父親手諭〉，《蔣經國先生全集》，冊2，頁270。

⁸⁸ 蔣經國的留蘇同學蔡省三於1939年冬曾在贛州看過他的一本文稿，題為「留蘇十三年」，那是由別人用十行紙清抄，字體恭正，不是蔣氏的手筆。蔡省三當時所讀的內容就是〈我在蘇聯的生活〉。這部文稿是用來作為訓練教材。1940年3月贛州發生「反共」捕人之後，傳說蔣介石因此嚴令蔣經國不准再外借。蔡省三，《蔣經國與蘇聯》，頁21-23。

至於附錄於克萊恩一書的另一版本〈我在蘇聯的日子〉，是克萊恩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辦事處主任(1958-62)時，蔣經國託他翻譯的。克萊恩聲稱，「蔣經國讓我看過一本簡便記事本，是他返回浙江不久，於1937年5月所寫。他要求我的妻子，也就是他的英文老師，把這本用中文寫成的回憶錄譯成英文。她照著他的意思做了，我們把譯好的打字稿交給他，供他存檔。」蔣經國將這篇回憶錄定名為〈我在蘇聯的日子〉。⁸⁹ 國史館現存有一份〈我在蘇聯的日子〉英文打字稿的綱要，是蔣經國於1965年初擔任國防部長不久後完成的。⁹⁰

到底蔣經國交給克萊恩的中文稿，是已經修改過，還是克萊恩妻子翻譯時才作修改？克萊恩夫婦與蔣經國私交甚篤，是否他們認為必須針對冷戰期間西方讀者的宣傳需要，將蔣經國塑造成一個堅強的反共抗俄領袖，而不得不將內容修改，或從回憶錄中特別抽取反蘇的部分，而刪除其餘？抑或是在最初由俄文翻譯成中文過程中，蔣經國已因實際的政治環境需要，而先作了修改？

此外，受到中國文化成聖成賢的觀念作祟，中國人特別喜歡將領袖人物理想化、神化，彷彿不這麼做，則不能彰顯這些領袖人物的偉大，就不配當領袖。因此若是下屬寫領袖人物的傳記或歷史，基於「為尊者諱」的心理，史實常會被扭曲。蔣經國自己寫傳記，雖沒有「為尊者諱」的心理，卻怕暴露了自己的缺點，而為屬下看輕，也故意省略或隱晦。〈我在蘇聯的日子〉與檔案所記載的會有這麼大的出入，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以上這些只是猜測。由於缺乏直接佐證的資料，這個議題事實上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本文所呈現出來的蔣經國形象，與我們過去所「熟知」的蔣經國不大一樣。但是，如果我們能將蔣經國在歷史上的角色從完美無瑕的領袖地位還原到人的位置，或許這樣的歷史較為真實可靠。

⁸⁹ 克萊恩著，《我所知道的蔣經國》，頁67。

⁹⁰ 國史館，《蔣經國總統檔案：忠勤檔案第27卷（部長回憶錄）》。